

特朗普“常识革命”：理念建构、政治实践与范式冲突

□ 刘飞涛

〔提 要〕特朗普在2025年第二任期就职演说中正式提出“常识革命”，并将其上升为统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官僚体系改革的整体性意识形态纲领。“常识革命”并非临时性竞选口号或浅层政策修辞，而是一场与传统常识政治相错位的，以反精英、反建制、反“觉醒”为动员旗帜，以“美国优先”为价值归宿，以行政集权与结果实用主义为治理手段，以本土蓝领与保守中产为社会基础的民粹保守主义政治运动。它在理念层面制造“民众—精英”“常识—专业”“国家主权—全球主义”的二元对立；在制度层面推动总统行政权急剧扩张、联邦文官体系结构性重组与治理逻辑的极端简化；在国际层面推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持续崩解，并引发全球范围内主权民族主义思潮的回潮。“常识革命”的内政外交影响广泛而深刻，但它并未摆脱美国政治左右摇摆的历史惯性，也无法完成其所期待的制度救赎。

〔关键词〕特朗普、常识革命、民粹保守主义、美国优先、美国政治

〔作者简介〕刘飞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771.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 (2026) 3 期 0040-23

近年来，随着逆全球化回潮和大国竞争加剧，全球政治图景呈现一系列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结构性变化：多边国际机制权威性持续下降，经济全球

化动能减弱并伴随明显的区域化与集团化转向，身份政治取代共识政治成为西方社会潮流，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力量在美欧主要发达国家实现突破性发展。作为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构建者、主导者与最大受益者，美国内部政治生态的变迁具有超越美国自身范围的世界性影响。如果说 2016 年唐纳德·特朗普突破传统共和党精英主导的选举格局成为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并首次赢得美国大选标志着右翼民粹主义政治的崛起，那么 2024 年特朗普再度赢得总统大选，则标志着美国政治正式进入一个以反建制、反精英、反“觉醒”为鲜明特征的全新历史阶段。与第一任期相对零散、事件驱动、议题波动较强的执政风格不同，在 2024 年共和党竞选纲领“美国优先：回归常识”^[1]的指引下，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执政呈现出理念化、制度化、体系化特征。在 2025 年就职演说中，特朗普以极具煽动性的话语正式提出“常识革命”（Revolution of Common Sense），宣称要终结由建制派长期主导的扭曲政治，清除盘踞在华盛顿的官僚利益集团与“深层政府”网络，破除政治正确对公共议题的话语垄断与道德绑架，回归普通美国人所信奉与依赖的“常识”，包括国家安全优先、经济利益优先、本土就业优先、传统价值优先等理念。“常识革命”在充当竞选工具之后又成为其执政合法性来源、政策制定根本准则与政治动员核心旗帜，深刻重塑美国内政外交议程，并引发美国社会的深度分裂。当前国内外学界多数研究将特朗普主义简化为民粹主义浪潮、个人威权风格、反全球化运动或交易型外交，较少将“常识革命”视为一套具有内在逻辑、话语结构与制度指向的完整政治范式进行系统性学术阐释。大量研究集中于外交政策与选举行为分析，对“常识”这一核心观念的思想史溯源、话语机制分析与制度化实践考察明显不足。本文通过对“常识革命”考察范式的建构，重点分析特朗普引领美国右翼民粹主义政治运动的广泛性、剧烈性及其对美国内政外交的深刻影响，揭示“常识革命”在美国发展进程中的

[1] “2024 Republican Party Platform,”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July 8, 2024, <https://www.presidency.ucs.edu/documents/2024-republican-party-platform>.

历史方位和未来前景。

一、“常识”的政治思想史谱系与特朗普式转向

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常识”大多是理性精神的代名词，在启蒙时代为民主、人权等社会进步共识的达成提供哲学和意识形态工具。美国独立战争正是在“常识”的动员和激励下展开的，在此后美国大部分历史进程中，“常识”通常与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运动相伴，但总体仍在共识政治和社会规范的目标框架内运行。而特朗普“常识革命”由于过度放大反精英、反建制而走向身份对抗和反智主义极端，与美国传统“常识”观念发生严重错位，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常识”范式的特朗普式转向。

（一）西方思想传统中的“常识”观念

“常识”（Common Sense）在西方政治思想中具有悠久、稳定且占据道德高地的传统。从古希腊哲学开始，常识便被理解为人類共通的感觉能力与理性基础，是连接个体认知与共同体秩序的关键纽带。亚里士多德将常识视为统合个别感官、形成完整统一认知的“共同感觉能力”^[1]，强调政治共同体的存续依赖共同价值、普遍理性与公共利益。这一概念成为西方经验主义哲学的源头，其后经历与无神论的对立和与怀疑主义的争论，^[2]至18世纪的英国形成了以托马斯·里德、亚当·斯密、法兰西斯·哈奇森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学派，又称“常识现实主义”^[3]学派。苏格兰启蒙学派将“常识哲学”推向理论高峰。该学派认为，人类知识与道德判断并非完全依赖抽象理性推演，

[1] Sophia Rosenfeld, *Common Sense: A Political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8.

[2] Christopher Holden, “Exploring the Roots of Populism in ‘Common Sense: A Political History,’” *PopMatters*, April 28, 2011, <https://www.popmatters.com/139983-common-sense-a-political-history-by-sophia-rosenfeld-2496045551.html>.

[3] Robert Curry, “Harvard’s Path from Common Sense and Realism ... to Postmodernism,” *WorldNetDaily*, June 7, 2025, <https://www.wnd.com/2025/06/harvards-path-from-common-sense-and-realism-to-postmodernism/>.

而是植根于普遍共享的常识直觉。^[1] 常识具有自明性、普遍性、稳定性与非专业性，是道德、法律、政治与日常生活秩序的共同基础。在这一思想传统中，常识不是某一群体的特殊利益或偏好，而是人类共通的理性能力与道德直觉。

对美国政治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常识文本，当属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识》。潘恩以通俗易懂、极具感染力的语言批判英国专制统治，主张独立、自治与共和政体，将常识塑造成反抗压迫、追求自由与共同体自治的合法性符号。在潘恩那里，常识意味着自然权利、自治理性、公共福祉与政治平等，具有普遍性、革命性与公共性。此后，“常识”一词在美国政治文化中长期占据道德制高点，成为政治家诉诸民众、凝聚共识、批判特权的重要话语资源。总体而言，传统常识政治具备三大核心特征：其一，普遍性，诉诸跨群体、跨身份的共同理性；其二，规范性，以自然权利、正义原则与公共利益为核心；其三，共识性，旨在构建社会团结而非加剧对立与冲突。

（二）美国政治传统中的“常识”话语

美国建国设计在思想源头上与常识现实主义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不言自明的真理”作为常识现实主义原则是推动北美殖民地寻求独立建国的核心理念，因此，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常识现实主义就是美利坚共和国的官方信条”，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通常又被称为“常识之国”。^[2]《常识》对北美殖民地普通民众的巨大动员作用从建国之初便为美国政治文化注入了强烈的民粹主义基因，其核心特征之一便是以“普通人的常识”对抗东部精英、金融资本、专业官僚与技术专家。19世纪30年代，在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担任总统期间，政治参与大规模向普通白人男性扩展，对精英特权与官僚体系的批判成为重要政治动员方式，并由此形成了美国历史上的“杰克逊政治传统”，其重要理念是相信“美国人

[1] Thomas Reid, “An Inquiry into the Human Mind,” July 2007, <https://www.earlymodern-texts.com/assets/pdfs/reid1764.pdf>.

[2] Robert Curry, “Restoring America with Common Sense,” RealClearPolicy, February 11, 2025, https://www.realclearpolicy.com/articles/2025/02/11/restoring_america_with_common_sense_1090622.html.

民的政治和道德本能是健全且值得信赖的，而且政府运作过程越简单直接，其结果就会越好”。^[1]19世纪50年代，杰克逊民主与反智主义结合催生美国入党（American Party）^[2]。该党派的理念是相信普通白人新教徒的生活常识、道德直觉比东海岸精英、知识分子、天主教教士的学问更可靠、更代表美国精神。美国入党具有强烈的排外主义及反移民倾向，反映了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早期张力。^[3]19世纪末，人民党（People's Party，又称 Populist Party）运动进一步将民粹主义推向高潮，批判金本位制度、垄断资本、东部银行集团与联邦官僚扩张，主张将共和国归还给“普通民众”，强调政府权力的拓展应以“民众的明智判断与历史经验”为指引。^[4]

20世纪初，随着进步主义和自由主义相继兴起，推崇理性和专家知识成为主流，民粹主义、本土主义以及反智主义开始长期蛰伏。20世纪60年代以后，现代保守主义运动兴起，至80年代，里根保守主义思想开始大行其道，反大政府、反官僚、重传统价值成为主流社会思潮。^[5]保守主义者长期批判联邦政府过度扩张、精英专家治国、进步主义价值主宰与多元文化侵蚀，强调地方自治、个人自由、传统道德与市场效率，形成一种以“普通人常识”对抗进步精英与官僚集团的稳定话语结构，以至于里根总统在告别演说中称他接受“里根革命”的叫法，但更倾向于认为“它更像是一次伟大的重新发现，一次对我们价值观和常识的重新发现”。^[6]

进入21世纪后，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开端，自称继承波士顿倾茶

[1] Walter Russell Mead, "The Jacksonian Tradition," *The National Interest*, Winter 1999, pp.5-29.

[2] 该党又称“一无所知党”，英文名称为“Know Nothing Party”。

[3] "American Party Platform of 1856,"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node/355656>.

[4] "Populist Party Platform of 1892,"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node/273285>.

[5] Gil Troy, *The Reagan Revolu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6] Ronald Reagan, "Farewell Address to the Nation," January 11, 1989, <https://www.reagan-library.gov/archives/speech/farewell-address-nation>.

精神的茶党运动兴起，他们打着 1776 年《常识》旗号，反联邦干预、反奥巴马医改、反气候变化政策、反多元文化，把《常识》所代表的启蒙精神，扭曲为反建制、反专家、反进步的右翼保守武器，从思想和文化上为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铺就了道路。纵观历史，美国历史上的民粹主义与保守主义虽有鲜明反精英倾向，但仍基本接受宪政框架、法治原则、代议民主程序与权力制衡理念，其“常识”诉求仍以维护共同体秩序为目标，并未走向激进的制度破坏、身份对抗与反智主义。

（三）特朗普的“常识革命”范式

特朗普所倡导与重构的“常识”，与西方近代以来的传统常识政治发生了显著错位，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为旗号的 MAGA 运动的兴起事实上代表了保守民粹主义常识范式的形成。

第一，从普遍理性转向传统保守价值尤其是宗教保守主义优先。传统常识诉诸全人类或全体国民的共同理性，特朗普常识则高度聚焦本土白人蓝领、保守中产与本土主义群体的特殊利益与传统保守价值偏好。特朗普在谈及共和党意识形态色彩时称，共和党算是保守派，但实际上主张“我们需要边境，我们需要公平选举，我们不希望男性参加女子体育比赛，我们不希望未经父母同意就给未成年人做变性手术的政党，这些 99.9% 都是常识”。^[1] 特朗普还通过行政命令方式宣布：“美国的政策是承认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这些性别是不可改变的，是建立在基本和无可争议的现实基础上的。”^[2] 特朗普还在白宫设立“白宫信仰办公室”，并成立“消除反基督教偏见特别工作组”，负责调查处理拜登政府时期对基督徒存在的“系统性歧视现象”，以彰显其

[1] Brooke Singman, “Trump Says GOP is ‘Party of Common Sense’ during Contentious Bloomberg Interview,” Fox News, October 15, 2024, <https://www.foxnews.com/politics/trump-says-gop-party-common-sense-during-contentious-bloomberg-interview>.

[2] The White House, “Defending Women from Gender Ideology Extremism and Restoring Biological Truth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January 20,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defending-women-from-gender-ideology-extremism-and-restoring-biological-truth-to-the-federal-government/>.

在性别、反堕胎等议题上与宗教保守主义高度一致的立场。

第二，从个体利益转向公共利益尤其是安全利益优先。传统常识以个体利益、自然权利以及服务于它们的法治与正义为核心，特朗普常识则以公共利益、公共安全与本土安全为最高准则，呈现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特征，以及上述两种面目之下的白人至上主义和种族优越论。公共政策出发点的转向意味着政策的执行有可能需要打破常规，特朗普在谈及可能动用国民警卫队甚至美国军队打击城市犯罪时称，对城市进行清理整治的目的是避免每个周末都会发生人员死亡的惨剧，“这并非战争，这是常识问题”。^[1]在特朗普的逻辑链条中，城市治安的恶化与非法移民对美国的“入侵”紧密关联。特朗普在宣布南部边境进入紧急状态时称，“南部边境被贩毒集团、犯罪团伙、已知的恐怖分子、人口贩子、走私犯、来自敌对国家未经审查的适龄男性以及危害美国人的非法毒品所侵占”，“这场入侵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广泛的混乱和痛苦”。^[2]

第三，从共识追求转向身份对抗。传统常识致力于弥合社会分歧、构建政治共识，特朗普常识则刻意强化民众与精英、本土与外来、传统与进步、美国与全球的对立，以二元对抗结构实现高强度政治动员。特朗普在谈及其政府与拜登政府的区别时称，拜登身边聚集着一群“激进的左翼狂热分子，他们都是聪明人，但在政策和常识方面却极其愚钝”^[3]。有无常识在此显然是特朗普用来区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身份标签。在被问及依据什么公式计算全球“对等关税”时，特朗普称“计算公式是基于常识，基于赤字，基于我

[1] Danielle Kurtzleben, “Trump Uses ‘Common Sense’ to Make a Political Point. It Has Populist Appeal,” NPR, October 22, 2025, <https://www.npr.org/2025/10/22/nx-s1-5581554/trump-common-sense>.

[2] The White House, “Declaring a National Emergency at the Southern Border of the United States,” January 20,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declaring-a-national-emergency-at-the-southern-border-of-the-united-states/>.

[3] Danielle Kurtzleben, “Trump Uses ‘Common Sense’ to Make a Political Point. It Has Populist Appeal.”

们多年来的待遇，基于原始数据”^[1]。在此，特朗普的常识显然就是只要存在贸易赤字就意味着美国受到了不公平贸易待遇，只要对美存在贸易顺差，就站到了美国利益的对立面。

第四，从程序规范转向结果实用主义。传统常识尊重法治、程序正义、专业判断与制衡机制，特朗普常识则以“效率”“结果”“见效快”为标准，对制度程序、专业知识、制衡约束与长期规划表现出明显的不耐烦甚至排斥。特朗普在宣布改革《联邦采购条例》时称，联邦采购系统所遵循的理念本是“及时为客户提供最具价值的产品或服务，同时维护公众的信任并实现公共政策目标”，“但自其颁布以来，《联邦采购条例》已膨胀至 2000 多页，演变成一个过于繁琐复杂的监管框架，并导致官僚机构臃肿不堪”。^[2]继“解放日”关税被美最高法院宣布违宪，而后其取消“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也受到最高法院的挑战，特朗普为此攻击最高法院称，“他们应当运用自己的常识为国家谋福祉。他们在关税问题上表现得极为糟糕，无端地让美国损失了数百亿美元本可获得的退税，只为讨好那些仇恨者和骗子”。^[3]国土安全部在其扩大非法移民搜查权的声明中称：“犯罪分子将再也无法在美国学校和教堂里藏匿起来逃避抓捕。特朗普政府不会束缚我们英勇执法人员的行动自由，而是相信他们能够运用自己的常识来处理问题。”^[4]

通过这四重范式转向，“常识”从一种普遍性公共理性符号，转变为民粹动员工具、反建制意识形态与利益分配准则，它们构成了“常识革命”的

[1] Jeff Mordock, “Trump Says Tariffs Based on ‘Common Sense’, ‘Deficits’ and ‘Very Substantial Facts,’” The Washington Times, July 10, 2025, <https://www.wmal.com/2025/07/10/trump-says-tariffs-based-on-common-sense-2/>.

[2] The White House, “Restoring Common Sense to Federal Procurement,” April 15,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4/restoring-common-sense-to-federal-procurement/>.

[3] Donald J. Trump, “Trump’s Truth,” April 6, 2026, <https://www.trumpstruth.org/status-es/37608>.

[4]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Statement from a DHS Spokesperson on Directives Expanding Law Enforcement and Ending the Abuse of Humanitarian Parole,” January 21, 2025, <https://www.dhs.gov/news/2025/01/21/statement-dhs-spokesperson-directives-expanding-law-enforcement-and-ending-abuse>.

观念基础与合法性来源。

二、“常识革命”的内政实践

“常识革命”范式的系统建构为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施政提供了政治哲学理据，成为特朗普用以统摄行政革命、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一条意识形态主线。

（一）行政革命：统一行政权

特朗普将联邦官僚体系视为阻碍民意、维护精英利益的“深层政府”核心载体，因此把行政革命作为“常识革命”的重要环节。

首先，复兴并强化“单一行政官”^[1]理论，主张总统对全部行政部门拥有绝对控制权，所有行政官员必须服从总统政治意志，削弱文官制度的独立性、中立性与专业性。特朗普政府发布《确保所有机构实行问责制》行政令，称宪法赋予总统所有行政权力，要求“行政部门的政策应确保总统对整个行政部门的监督和控制”，“所有行政部门和机构，包括所谓的独立机构，应将所有拟议的和最终的重大监管行动提交给总统行政办公室下属的信息与监管事务办公室（OIRA）进行审查后，方可在《联邦公报》上发布”。^[2]白宫在随后的政策说明中更加明确强调，因为所有行政权力都归总统所有，因此所有机构都必须：“将拟议的法规提交给白宫审查，对于所谓的独立机构（除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职能外）没有例外情况；行政令还要求所有机构都必须就其优先事项和战略计划与白宫进行沟通，而白宫将设定其绩效标准。”^[3]

[1] Cass R. Sunstein and Adrian Vermeule, “The Unitary Executive: Past, Present, Future,” *The Supreme Court Review*, Vol.2020, No.1, 2020, pp.83-117.

[2] The White House, “Ensuring Accountability for All Agencies,” February 18,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2/ensuring-accountability-for-all-agencies/>.

[3]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Reins in Independent Agencies to Restore a Government that Answer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February 18,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fact-sheets/2025/02/fact-sheet-president-donald-j-trump-reins-in-independent-agencies-to-restore-a-government-that-answers-to-the-american-people/>.

美国法学界学者就此评论称，实际上特朗普所表达的意思是“我就是法律，我的意志就是法律”。^[1]

其次，推行联邦公务员 F 岗（Schedule F）改革。早在 2020 年 10 月第一任期后期，特朗普即发布第 13957 号行政令^[2]，准备实行联邦公务员岗位任职改革，但未及实施即被后任拜登政府废除。2025 年第二任期开始后，特朗普再度发布行政令，宣布“恢复联邦政府部门中对政策制定有影响职位的问责机制”^[3]，在联邦公务员“例外服务”体系中，新增 F 类职位分类，专门针对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机密事务、高层管理等岗位，取消这些岗位的终身 / 长期就业保护、竞争性招聘、解雇申诉权、绩效保护，转为总统可自由任免、随时解雇且无需理由、无上诉渠道的政治任命类职位，其目的是为大规模清洗异见官僚、重塑联邦官僚体系、贯彻总统意志提供关键制度工具，为落实“排干沼泽”^[4]政策提供合法依据。为推进 F 岗改革落地，特朗普政府成立由埃隆·马斯克牵头的政府效率部（DOGE），在其核心运作的五个月时间内，重点推进机构裁员、削减预算、去监管等行动。联邦人事管理局（OPM）数据显示，2025 年联邦政府范围内超过 31.7 万名联邦雇员离职，裁员规模最大的三个部门分别是国防部、农业部和财政部，其中国防部裁员超过 61600 人，约占其员工总数的 8%；财政部裁员超过 31600 人，裁减比例接近 28%；农业部裁员超过 21600 人，裁减比例约为 22%。^[5]另外，美国国际

[1] Jacob Knutson, “What is Unitary Executive Theory? How is Trump Using It to Push His Agenda?” February 20, 2025, <https://www.democracymarket.com/analysis/what-is-unitary-executive-theory-how-is-trump-using-it-to-push-his-agenda/>.

[2] The White House, “Executive Order on Creating Schedule F in the Excepted Service,” October 21, 2020,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presidential-actions/executive-order-creating-schedule-f-excepted-service/>.

[3] The White House, “Restoring Accountability to Policy-Influencing Positions within the Federal Workforce,” January 20,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restoring-accountability-to-policy-influencing-positions-within-the-federal-workforce/>.

[4] Tim Donner, “Schedule F—Trump’s Plan A for Emptying the Swamp,” Liberty Nation News, November 29, 2024, https://www.libertynation.com/schedule-f-trumps-plan-a-for-emptying-the-swamp/?utm_source=partner&utm_campaign=ZeroHedge.

[5] Drew Friedman, “How Staffing Cuts in 2025 Transformed the Federal Workforce,” January 1, 2026, <https://federalnewsnetwork.com/workforce/2026/01/how-staffing-cuts-in-2025-transformed-the-federal-workforce/>.

开发署被正式关闭，教育部仍在按照特朗普的指令走在将被解散的路上。^[1]

最后，高度依赖行政令治国的模式，大量使用总统行政命令与总统备忘录绕过国会立法程序，体现结果导向的实用主义理念。历史数据显示，自1969年以来，美国完成完整任期的10位总统平均签署270项行政命令；完成两届任期的总统平均签署332项，而完成一届任期的总统平均签署207项。^[2]相较而言，特朗普在第二个任期一年左右时间内已签署了252项行政命令（截至2026年3月26日），其行政命令发布密度、频率明显超过历届总统。^[3]上述行政命令涵盖联邦行政改革、移民与边境、能源与环境、贸易与经济、外交与国际、社会文化与教育等领域，可谓全政府行政命令治理。传统上，当国会的一院或两院都被反对党掌控时，总统就会倾向于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应对，但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以来密集发布行政命令恰恰是在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的背景下进行的，这也说明特朗普有意通过扩大总统权的方式来推进治理。特朗普大肆扩张总统权力的做法引发大量指控联邦政府违宪的行政诉讼。比如，特朗普发布的涉及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受到22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的违宪诉讼；有关加征芬太尼关税和“对等关税”的行政令遭到12个州的联合诉讼。^[4]

特朗普行政革命的本质，是以总统集权打破建制官僚壁垒，使其个人及政党政治意志直接穿透治理体系，实现“常识”议程的快速推进和有效落地。

（二）经济革命：产业民族主义与“公平贸易”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经济政策既有“减税去监管”的新自由主义工具，亦

[1] The White House, “Improving Education Outcomes by Empowering Parents, States, and Communities,” March 20,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3/improving-education-outcomes-by-empowering-parents-states-and-communities/>.

[2] The USAFacts Team, “How Many Executive Orders Has Each President Signed?” April 1, 2026, <https://usafacts.org/articles/how-many-executive-orders-has-each-president-signed/>.

[3] *Ibid.*

[4] United States Democracy Center, “Executive (Dis)Order: Trump’s Unprecedented Use of Executive Orders and How States Are Fighting Back,” January 15, 2026, <https://statesunited.org/resources/executive-order-report/>.

有“关税保护、政府入股”的国家干预主义。如果说从政府干预程度上看，特朗普对内经济政策并没有跳出伴随两党政权轮替所带来的政策摇摆轨迹，但全面提高关税则是对美国二战结束以来长期奉行的自由国际主义贸易政策的背离，因而特朗普的经济革命可以说是反自由国际主义的“混合经济革命”，其核心逻辑是：以直观经济利益替代抽象自由贸易理论，以本土产业振兴与就业增长替代全球分工效率目标。

第一，推行“公平贸易”原则，对贸易顺差国家加征关税，重新谈判各类多边及双边贸易协定，以减少贸易逆差、保护本土制造业与就业岗位。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宣称美国迎来“解放日”，宣布以美国长期货物贸易逆差构成“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实施所谓“对等关税”：一方面自4月5日起对几乎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的基准关税，另一方面自4月9日起对部分贸易伙伴加征更高的国别关税。此举在世界范围内挑起关税大战，相较于以前，特朗普此轮关税政策有以下特点。一是波及范围广。几乎所有美国贸易伙伴，不论是盟友还是非盟友，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一幸免地受到了特朗普关税的波及。二是力度大。据耶鲁大学的跟踪研究，特朗普加征“对等关税”前美国平均关税率为2.3%（2025年1月），一年后（2026年1月）该数据升至10.6%。^[1]三是名目繁多。已推出的关税政策包括“对等关税”、钢铝关税、芬太尼关税、涉俄石油关税，甚至还准备推出格陵兰岛关税。事实上，加征关税已成为特朗普推行胁迫外交随时可以挥舞的大棒。四是加减关税决策随意性强。韩国、印度等都经历了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剧烈摇摆。五是没有遭遇大规模关税反击。除中国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选择对美妥协。特朗普以高关税为胁迫手段迫使世界各国分别与美国达成关税水平不等的多个双边贸易协定，试图推动世界贸易体系从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础的多边框架转变成以美国为轴心、以众多双边贸易协定为支撑的“伞状”

[1] The Budget Club, “Tracking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ariffs,” April 1, 2026, <https://budgetlab.yale.edu/research/tracking-economic-effects-tariffs>.

贸易结构,核心目的是以美国市场为筹码重构美国作为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位,同时通过高筑关税壁垒推动产业回流,重振美国制造业。

第二,实施大规模减税与放松监管政策,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鼓励企业回流与本土投资,刺激能源、基建与制造业扩张。2025 年 7 月,《大而美法案》签署生效,该法案在减税、去监管、削减福利、传统能源优先等议题上坚持“里根经济学”要义,因而一定意义上仍是“华盛顿共识”的延续。具体政策包括:减税,包括永久延长 2017 年《减税与就业法案》(TCJA)中的企业所得税减免条款,将企业税率锁定在 21%,取消小费与加班工资税,汽车贷款利息扣除;削减社会福利,包括削减医疗补助、收紧食品援助、减少联邦学生贷款援助额度等;取消清洁能源补贴,终止电动汽车 7500 美元税收抵免,解除海上钻探限制,扩大石油、天然气开采;取消 800 美元以下包裹免税政策(小额豁免规则)。^[1]

第三,战略性产业和市场干预。特朗普的大规模减税、放松监管政策,符合新自由主义的“最小政府”和“自由市场”主张,但其对外高筑关税壁垒显然又是反市场原则的。在产业政策方面,他强烈反对拜登政府的产业补贴政策,但另一方面又以行政干预方式更加直接地卷入特定企业运营,尤其是以政府强制入股方式干预企业生产。截至 2026 年 1 月,也就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首年内,美国政府投入超过 100 亿美元,获得 11 家公司的股权。^[2] 这些公司涵盖半导体、核能和稀土矿产等领域,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对战略性关键产业的高度重视,并展现了一种以更大力度介入战略性行业企业并直接干预生产的强硬姿态。

[1]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Trump’s One Big Beautiful Bill Is Now the Law,” July 4,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2025/07/president-trumps-one-big-beautiful-bill-is-now-the-law/>.

[2] Jeff Rumage, “Trump Is Using Your Taxes to Boost Chipmaking and Rare Earths — But He Also Wants His Cut,” January 28, 2026, <https://builtin.com/articles/companies-trump-administration-is-investing-in>.

特朗普的市场干预行为更多从选举政治角度考量。特朗普政府与谷歌、微软、Meta、甲骨文、xAI、OpenAI 和亚马逊等七家大型科技公司达成协议，上述公司将通过签署“纳税人权益保护承诺书”方式，承诺建设或购买为数据中心提供所需大量电力的设施、电网接入的基础设施并支付与普通消费者不同的电价。^[1] 特朗普称，这些措施将确保美国民众免受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并从电网升级和增强电网抗灾能力中获益，^[2] 但从政府、企业、市场三者关系看，此举不仅直接介入了企业的经营生产，而且限制了市场的价格调节作用，实质上与“拜登经济学”^[3] 有异曲同工之意。

特朗普经济革命以贸易赤字、减税、去监管、制造业回流、物价水平等与普通民众直观感受密切关联的“常识”性经济指标作为推进政策杠杆，呈现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与实用主义导向。

（三）社会革命：反觉醒主义与传统价值复位

近年来，觉醒主义（wokeism）已成为美国社会、政治和文化辩论中的核心主题。这一概念起源于非裔美国人社社区，最初是呼吁对宗族歧视和社会不公现象“保持警觉”，后来含义进一步扩展，成为涵盖性别平等、LGBTQ+ 权利、环境正义和经济平等广泛内容的社会导向性概念，并成为奥巴马、拜登等民主党政府系统性推动制定支持边缘化群体、促进包容性政策、工作场所准则和教育课程。明显具有左翼进步主义色彩的“觉醒主义”思潮和运动对美国社会传统右翼保守主义势力形成强烈冲击并激起后者强烈反弹，这正是 MAGA 运动兴起的社会动因。从这一意义上讲，特朗普的“常识革命”正

[1] The White House, “Ratepayer Protection Pledge,” March 4, 2026, <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2026/03/ratepayer-protection-pledge/>.

[2] The White House, “Ratepayer Protection Pledge Proclamation,” March 4, 2026,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6/03/ratepayer-protection-pledge-proclamation/>.

[3] The White House, “Bidenomics is Working: The President’s Plan Grows the Economy from the Middle Out and Bottom Up—Not the Top Down,” June 28, 2023,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6/28/bidenomics-is-working-the-presidents-plan-grows-the-economy-from-the-middle-out-and-bottom-up-not-the-top-down/>.

是对觉醒主义运动、多元文化主义与身份激进主义的反向矫正。

在教育领域，批判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历史与西方文明的解构，强调爱国主义教育与传统价值回归，推动课程内容向历史常识与国民认同方向调整。特朗普在教育领域的“整肃”行动从打击高校所谓反犹太主义开启，矛头直指进步主义精英。2024年美国高校普遍爆发针对巴以冲突的反战示威活动，共和党指责拜登政府打击反犹太主义不力。2025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发布“打击反犹太主义补充措施”行政命令，^[1]宣布恢复其第一任期发布的“打击反犹太主义行政令”，宣称“致力于打击美国及全球范围内反犹太主义和反犹太事件的上升势头”^[2]，并由美国司法部牵头成立包括教育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等机构人员的打击反犹太主义特别工作组，重点清除校园里的反犹太骚乱。^[3]特朗普政府通过威胁取消科研资助、停止国际招生以及税收罚款等手段先后迫使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知名高校接受联邦政府条件，其后又系统性推出“高等教育卓越学术契约”，要求宾夕法尼亚大学、南加州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多所重点高校承诺“必要时动用合法武力来阻止违法行为”。^[4]“高等教育卓越学术契约”还明确提出：“在作出任何有关本科生或研究生招生及经济资助的决定时，不得明示或暗示地考虑性别、族裔、种族、国籍、政治观点、性取向、性别认同、宗教归属，或任何可替代上述因素的

[1] The White House, “Additional Measures to Combat Anti-Semitism,” January 29,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additional-measures-to-combat-anti-semitism/>.

[2] The White House, “Executive Order on Combating Anti-Semitism,” December 11, 2019,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presidential-actions/executive-order-combating-anti-semitism/>.

[3]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Justice Department Announces Formation of Task Force to Combat Anti-Semitism,” February 3, 2025, <https://www.justice.gov/opa/pr/justice-department-announces-formation-task-force-combat-anti-semitism>.

[4] Mark Barnes et al., “White House Invites Nine Universities to Enter ‘Compact’ in Exchange for Access to Federal Funds and Other Benefits,” October 8, 2025, <https://www.ropesgray.com/en/insights/alerts/2025/10/white-house-invites-nine-universities-to-enter-compact-in-exchange-for-access-to-federal-funds>.

指标；但对于完全或主要由特定性别或特定宗教教派学生组成的机构，可作适当例外。”^[1]

特朗普在教育领域的另一重大行动是推行历史“正统”主义，倡导“爱国主义教育”。通过文宣导向和文化符号的变更，重塑美国社会历史记忆，为复兴以“民族主义”“白人至上”等为核心信条的右翼保守主义提供政治文化土壤。特朗普发布“终结 K-12 学校教育中的激进灌输”行政令，重建 2020 年 11 月设立的“1776 总统顾问委员会”，致力于终结否定美国、反对美国的“激进美国历史观”。^[2]2025 年 3 月，特朗普发布行政命令指责美国流行的历史修正主义把美国历史“重新解读为本质上带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压迫性，或者存在其他无可救药缺陷的历史”，要求史密森学会（含 14 所博物馆）移除“分裂的、以种族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誓言要“让史密森学会重新回到其应有位置，成为激励人心和展现美国伟大精神的象征”。^[3]在重塑美国历史文化符号方面，特朗普提议将阿拉斯加的丹奈利山改回其旧称麦金利山，并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借美国建国 250 周年来临之际，设立“自由 250”工作组，希望通过举办各种庆祝活动以“加强国家团结和对历史的尊重，展现美国之美，并激励美国领导力和创新精神开启下一个篇章”。^[4]

在移民领域，以国家安全、公民身份门槛、文化同化与社会秩序为核心常识原则，收紧非法移民管控、强化边境墙建设、提高入籍标准、缩减难民接收规模。特朗普第一任期就已推出以建墙、驱逐非法移民和择优吸纳移民

[1] Jessica Corbett, “Trump Pressures Top Universities to Sign ‘Extortion Agreement’ for Federal Funds,” October 2, 2025, <https://www.commondreams.org/news/trump-university>.

[2] The White House, “Ending Radical Indoctrination in K-12 Schooling,” January 29,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ending-radical-indoctrination-in-k-12-schooling/>.

[3] The White House, “Restoring Truth and Sanity to American History,” March 27,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3/restoring-truth-and-sanity-to-american-history/>.

[4] “President Trump Launches Freedom 250 to Lead America’s 250th Birthday Celebration,” December 18, 2025, <https://freedom250.org/news/president-trump-launches-freedom-250>.

等为主要内容的“常识性移民政策”，^[1]但未及全面铺开。2025 年特朗普之所以能够重返白宫，其移民政策主张是重要加分项，这也为其在更大力度、更大规模上推进移民政策改革提供了民意基础。特朗普的具体行动之一是扩张移民执法机构的权力并强化其执法能力。特朗普发布“保护美国人民免受入侵之害”行政令，宣布“美国的政策是严格执行移民法，反对所有不被接纳和应被驱逐的外国人，尤其是那些威胁到美国人民安全或稳定的外国人”。^[2]同时，国土安全部宣布废除拜登政府时期设定的移民执法“敏感地区”，授权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可以在学校、教会、医院和公共集会场所进行抓捕，宣称“特朗普政府不会困住执法人员的双手，而是相信他们会凭借常识行事”。^[3]ICE 与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CIS）发布备忘录规定，允许拘留在美国居住至少一年但仍未获得绿卡的合法难民，推翻了 ICE 长期以来的一项政策，即不得以入境一年但仍未获得绿卡为由对难民实施拘留。^[4]二是强化边境封控，重点拦截非法越境。特朗普上任第一天即宣布全国边境进入紧急状态，恢复并扩大了边境墙的建设工作，在埃尔帕索和里奥格兰德河谷等关键地区新增了数十英里的建设工程，部署国民警卫队和现役军人到边境。三是扩大移民拘留规模并开展大规模驱逐行动。2025 年，美国境内羁押

[1]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Common Sense Immigration Policies: Protecting American Security, Sovereignty & Prosperity,” September 16, 2020, <https://www.dhs.gov/publication/common-sense-immigration-policies-protecting-american-security-sovereignty-prosperity>.

[2] The White House, “Protecting the American People Against Invasion,” January 20,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protecting-the-american-people-against-invasion/>.

[3]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Statement from a DHS Spokesperson on Directives Expanding Law Enforcement and Ending the Abuse of Humanitarian Parole,” January 21, 2025, <https://www.dhs.gov/news/2025/01/21/statement-dhs-spokesperson-directives-expanding-law-enforcement-and-ending-abuse>.

[4]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Memorandum for: 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USCIS) and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ICE),” February 18, 2026, https://assets1.cbsnewsstatic.com/hub/cms/prod_cms_alt/file/2026/02/19/07a4154f-13b7-4167-8022-0e0a6c6eaf3e/uscis_memo_1.pdf?tag=MSF0951a18.

被捕人员的拘留床位数量从 2024 年下半年的日均约 1.4 万张增至 2026 年 1 月的约 5.7 万张。^[1] 同期,国土安全部宣称,有将近 300 万非法移民离开美国。^[2] 四是全面收紧移民准入政策,包括严格限定并重新解释美国宪法赋予在美国出生者的公民权、^[3] 加强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审查、对申请进入美国的外国人实施最大程度的审查和筛选等举措;^[4] 大幅度扩大旅行禁令适用国家范围,把适用禁令的发展中国家从最初 19 个扩大至 40 个;确立基于财富标准的工作签证和移民接纳门槛。总之,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通过边境封锁、非法移民拘留和大规模移民驱逐以及选择性接纳部分高价值移民,事实上已经完全重塑了美国的传统移民政策。

在性别与家庭议题上,反对激进性别观念与性别意识形态扩张,回归传统家庭伦理与社会普遍直觉,以社会常识对抗进步精英价值主导。特朗普政府是以“反觉醒文化”为旗号推动传统保守主义社会价值回归的,尤其是回归基督教传统家庭价值。在堕胎和生育权利问题上,联邦层面不推全国堕胎禁令,支持红州全面限制、蓝州保留权利的分裂格局,限制联邦资金流向支持堕胎的政策或机构。在性别和性少数群体权利方面,禁止跨性别者参军,取消医保覆盖跨性别医疗费用,推动立法将性别定义为出生时的生理性别,

[1] Graeme Blair and David Hausman, “One Year of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Under the Second Trump Administration,” April 7, 2026, <https://deportationdata.org/analysis/immigration-enforcement-first-year.html>.

[2]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 Sets the Stage for Another Historic, Record-Breaking Year Under President Trump,” January 20, 2026, <https://www.dhs.gov/news/2026/01/20/dhs-sets-stage-another-historic-record-breaking-year-under-president-trump>.

[3] The White House, “Protecting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American Citizenship,” January 20,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protecting-the-meaning-and-value-of-american-citizenship/>.

[4] The White House, “Protecting the United States from Foreign Terrorists and Other National Security and Public Safety Threats,” January 20,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protecting-the-united-states-from-foreign-terrorists-and-othernational-security-and-public-safety-threats/>.

否定性别多元。^[1] 在宗教自由与传统家庭价值方面，扩大“宗教自由豁免”，允许企业或机构以宗教信仰为由，拒绝服务性少数群体、堕胎相关需求。

特朗普社会革命试图通过政治手段重塑主流文化认同，修复被多元文化与左翼激进主义撕裂的社会共识。

三、“常识革命”的影响

特朗普通过对“常识革命”范式的建构，使得民粹保守主义运动得以在更大社会范围内以更加激烈的方式展开，给美国带来了更加广泛、更加深刻的社会冲击，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场剧烈的政治矫正、秩序颠覆和价值重建。特朗普“常识革命”揭示的是当代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核心难题，即如何平衡大众意愿与专业治理、国家利益与全球责任、文化团结与多元包容，但从“常识革命”的初步结果及影响看，它非但没有找到上述问题的破解之道，反而进一步加剧和深化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性矛盾。

（一）行政权扩张导致三权分立更加失衡

“常识革命”高度依赖总统行政权力的单边运作，导致美国三权分立结构出现明显失衡。国会立法功能被持续边缘化，大量核心公共政策通过行政令实施，国会立法监督、财政约束与调查能力显著下降。司法与行政频繁出现高强度对抗，总统对司法判决的质疑、拖延甚至不执行倾向增强，司法权威与法治统一性受到冲击。总统权力边界不断外移，形成强行政、弱立法、弱制衡的新格局。这种趋势引发关于美国宪政体制稳定性、民主规范性与权

[1] The White House, “Defending Women from Gender Ideology Extremism and Restoring Biological Truth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January 20,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defending-women-from-gender-ideology-extremism-and-restoring-biological-truth-to-the-federal-government/>.

力约束有效性的深刻担忧，也埋下未来制度冲突与宪政危机的隐患。^[1]

（二）政党极化导致政治生态更加零和化

树立常识旗号是民粹主义的一种运动策略，旨在制造“我们与他们”的身份对立。^[2]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身份政治势必进一步强化共和党内部民粹化转向，推动共和党从传统古典保守主义向民粹保守主义全面转型。民主党则走向更激进的进步主义立场，对立对抗成为应对特朗普“常识革命”的核心政治议程。两党政策妥协空间急剧萎缩，政治议题高度情感化、身份化、对抗化，中间选民群体持续萎缩，政治温和力量不断被边缘化。美国政党政治进入高度极化的零和博弈状态，跨党派治理妥协机制基本失效，政治对抗、政府停摆、制度僵局成为常态。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大规模移民拘留和强制遣返政策，在加利福尼亚州和明尼苏达州等民主党主政地区引发大规模示威抗议甚至是暴力抵制，美国国土安全部被迫多次调整执法节奏与部署，并因国会停止拨款而部分陷入停摆。^[3]

（三）精英合法性危机导致反智主义泛滥

“常识革命”对专业知识体系与精英权威的系统性解构，引发美国社会深刻的合法性冲突。一方面，大众对建制派精英长期治理失信、利益俘获、脱离民众的不满具有现实社会基础，“常识革命”代表了民众对政治代表性危机的正当性反弹。另一方面，过度否定专业判断、科学权威、学术共识与媒体事实核查，容易导致决策短期化、情绪化与非理性化，形成治理专业性与大众代表性之间的尖锐结构性矛盾。这一矛盾将长期困扰美国政治运行，成为美国政治体制应对复杂治理挑战的深层障碍。哈佛大学一位青年学生就

[1] Steven Levitsky and Daniel Ziblatt, *How Democracies Die*, New York: Crown Publishing, 2018.

[2] Rylie Jones, “Polarization and Anti-Intellectual Senti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December 2, 2025, <https://www.colorado.edu/polisci/2025/12/02/polarization-and-anti-intellectual-sentiment-united-states>.

[3] Nicole Sganga, “‘A Breaking Point’: Inside the 68-day DHS Shutdown,” CBS News, April 23, 2026, <https://www.cbsnews.com/news/dhs-shutdown-breaking-point/>.

此撰文称：“反智主义，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都对我们的民主制度构成了潜在但严重的威胁。当我们任由宗教极端主义凌驾于科学之上，任由民粹主义的愤怒掩盖专业知识，任由教育沦为达成某种目的的手段时，这个国家就会丧失批判性思考、质疑权力以及展望进步的能力。”^[1] 该评论充分体现了美国青年知识精英对于反智主义泛滥的沮丧和担忧。

（四）“常识革命”导致“美国优先”原则极端化

由于零和博弈思维占据主导，美国不惜摒弃西方长期主导的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成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最大破坏者。特朗普以交易型外交取代价值观同盟，重塑美国同盟外交的底层逻辑，传统同盟体系凝聚力下降，盟友普遍寻求战略自主，地缘竞争与区域冲突风险上升。特朗普政府“退群毁约”的种种行为也显示，常识现实主义者对国际组织、气候协定、跨国人权机制持高度怀疑的态度，拒绝承担超出美国直接利益的国际责任与公共产品供给。这种发展必将持续削弱多边国际机制权威，加剧全球治理碎片化趋势，令全球治理步履维艰。“常识革命”还具有极强的国际示范效应，其反精英、反移民、反全球化、强调民族优先与强力领导人风格为全球右翼民粹势力扩张提供了模板和路径指引，欧洲多国右翼政党、拉美本土主义势力、亚洲保守派政治力量均不同程度受到鼓舞与示范，全球主权民族主义思潮持续回潮。“常识革命”还推动了美国民族主义、宗教和暴力的融合，致使特朗普政府倾向于把赤裸裸的对外侵略，如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描绘成“上帝神圣计划的一部分”，^[2] 加剧了战争对抗的烈度和双方寻求妥协的难度。总之，特朗普“常识革命”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美国国内政治，成为影响21世纪世界政治走向、意识形态格局与国际秩序变迁的重要因素。

[1] Shloka Bhattacharyya, “The Rise of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Society,” October 10, 2025, <https://wesleyanargus.com/2025/10/10/the-rise-of-anti-intellectualism-in-american-society/>.

[2] David Wippman and Glenn C. Altschuler, “Trump’s Profane Crusade is Taking America down a Dark Path,” April 19, 2026, <https://thehill.com/opinion/white-house/5836320-trump-war-rhetoric-danger/>.

四、结语

特朗普“常识革命”本质上是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时代美国社会危机、阶层危机、文化危机与政治代表性危机集中爆发的政治产物，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在 21 世纪的融合形态。它既是对建制派精英长期失信的强烈反弹，也是对自由国际主义与多元文化秩序的系统性否定。尽管“常识革命”在形式上轰轰烈烈，但其内在张力和结构性矛盾亦十分突出。一是常识简化性与治理复杂性冲突。现代社会经济、公共卫生、科技发展、气候变迁、国家安全等议题高度复杂，无法仅依靠直观常识决策，过度简化易导致短期行为、政策失衡与长期风险累积。二是行政激进主义与宪政秩序冲突。总统权力持续扩张将引发国会、司法与社会反弹，可能诱发制度对抗、法律僵局甚至宪政危机。三是本土利益与全球责任冲突。过度强调“美国优先”将削弱美国国际影响力，破坏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加剧地区动荡，最终反噬美国自身安全与经济利益。四是动员性与制度化冲突。“常识革命”高度依赖个人魅力与情感动员，缺乏稳定的组织基础、制度根基与跨阶层社会共识，难以转化为长效、稳定、可持续的政治秩序。

正是由于其内在结构性矛盾的制约，可以说特朗普“常识革命”不是一场致力于完成制度重建的真正革命，从运行规律上没有摆脱美国政治左右摇摆的传统轨道。因此，短期来看，“常识革命”仍具有强大动员能力与政策执行力，能够快速兑现部分选民利益，维持选民基本盘支持。中期来看，制度制约、司法对抗、社会分裂与国际反弹将不断加剧，执政成本持续上升，政策落地难度加大，接下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将是对“常识革命”成色的一次全面测试。长期来看，若无法实现阶层和解、制度重建与社会共识修复，“常识革命”难以形成稳定、可持续的政治秩序，其历史遗产更可能是持续的政治动荡与制度极化，并将随着美国政治运行逻辑或沉或浮。美国历史上民粹

主义的兴衰周期短则 3-5 年，长则 15-20 年，特朗普的保守民粹主义大概率不会突破上述历史时限。2026 年 2 月美国最高法院明确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的大规模全球关税超越权限，属于违宪行为。此举可谓是“常识革命”在经贸领域遭受的重大挫折，考虑到特朗普的移民和行政改革也日益受到阻滞，这似乎也预示着特朗普引领的保守民粹主义潮流将迎来由盛转衰的重要节点。

质言之，“常识革命”既不是美国民主的自我救赎，也不是简单的民主倒退，而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全球化、技术变革与阶层撕裂下的必然政治反应，它试图用激进的手段来捍卫保守的理念，用回到过去的方式为美国寻找未来，因而“常识革命”并非真正意义的革命，而是美国发展进程中的又一次历史反动。不过需要看到的是，它所提出的问题——精英与民众的鸿沟、专业治理与大众意愿的平衡、国家利益与全球责任的协调——无疑揭示了西方国家的现代发展困境，也将深刻影响 21 世纪世界政治的走向。

【责任编辑：宁团辉】